

自由人生活在政治之內 還是之外？

● 崔衛平

我們從哈維爾 (Václav Havel) 那裏熟悉了一個表述：「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哈維爾用此來表述他稱之為「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某個本質——你可以按你的意願裝修自己的房子，於其中擺放你「自由地」選擇來的某個牌子的洗衣機和電冰箱，但對於其他的事情，你還是走開為好。你不可以用你的鼻子東嗅嗅，西嗅嗅，發現社會生活中有哪兒不對頭。這位後極權主義社會的深刻揭示者，他的許多表述和那位《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初版於1951年)的作者阿倫特(Hannah Arendt)有一脈相承之處。雖然我還沒有找到直接的證據來證明哈維爾如何受到阿倫特的影響(他對海德格爾[Martin Heidegger]倒是提起過)，但閱讀這兩個人的著作後會發現：作為哈維爾的後極權主義批判的重要前提，正是阿倫特對於極權主義批判的理論成果。

和哈維爾一樣，阿倫特最初對政治也不感興趣，但他們都屬於真誠無

欺的人，忠直於自己的生活環境和歷史境遇，並從中發展出他們全部的思想理論。阿倫特少年時醉心詩歌和哲學，儘管母親給她聲情並茂地講過盧森堡(Rosa Luxemburg)的故事，但這並沒有使13歲的姑娘持續關注這一歷史事件。1924年她師從海德格爾，很快一頭扎進與老師「無世界性」的愛情之中，秘密地享受着投在與世隔絕的「林中空地」的點滴光亮。及至被海德格爾「遣送」到雅斯貝斯(Karl Jaspers)的門下，於海德堡大學完成學業，也自始至終沉浸在思辯哲學的氣氛之中，所完成的博士論文題為《論奧古斯丁的愛》(Libesbegriff bei Augustine)。在這期間，戈培爾(Joseph Goebbels)以這所大學校友的身份到此地做過一次演講，甚至希特勒本人於1927年8月的某天也來到這個地方，發表了《何為納粹主義》的演講，當地報紙報導了這個消息，但這些都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注意。海德堡大學哲學系的學生普遍認為政治是庸俗的，阿倫特當然也不例外。改變

阿倫特思想道路的是她的命運——希特勒的瘋狂行動使她最終看清了自己無法逃脫身為猶太人這個事實，以及由此帶來的「賤民」位置。這裏用得上拉康 (Jacques Lacan) 的「誤認」一說，即富有的、受過教育的猶太人對自身的認識是一回事；而他們實際上所處的社會、政治地位又是另外一回事。按拉康的意思，我們每個人都難以逃脫誤認的陷阱，但像猶太人這樣對自身實際處境一廂情願的誤認實屬罕見，從中已經蘊涵了他們日後遭遇到的巨大災難。

從缺乏根本上的平等政治權利來說，當時的猶太人是「賤民」；但是這並不妨礙他們其中的許多人事實上已經成為社會上的「新貴」——不只是有錢，實際上和所處國家政府的關係也十分密切，尋求統治者保護的心態使得他們順從地效忠於不同的政府，給予這些政府以經濟上的支持。阿倫特舉法國著名的猶太富豪羅斯希爾德家族為例。1848年，在幾乎不到24小時之內，這個家族就從路易·菲利普轉向新的法蘭西共和國，接着又轉向拿破崙三世，給這個國家不同政府的軍事行為提供經濟後盾。可以說，沒有這個家族的財力援助，與法國有關的當時歐洲的那些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從中也正好可以說明，這個猶太富豪家族並沒有任何政治觀點，他們在政治上完全是冷漠的和消極的。經濟上的雄厚實力並沒有使他們獲得相應的政治地位、取得政治身份和在政治生活中發揮應有的作用。在整個社會並沒有打算承認猶太人平等的社會政治權利的情況下，他們之所以被接受和處於某個顯赫位置，是作為某個

「例外人物」，是被看作「特殊的猶太人」，他們經常聽到的一句恭維話是：「不像猶太人」。沒有比這句話更能說明某種游離狀況——不像猶太人而又是猶太人，他們是自身所屬群體的一個例外，但這並沒有使得他們自動加入到其他人的群體中去，他們和社會之間有着一道看不見的牆，例外只能永遠是例外。因此，不管這些人意識到甚麼程度，他們事實上和他們另外一些並不富有也沒有受過甚麼教育的猶太同胞一樣，仍然處於政治上的隔離和被排斥狀態，有些東西把他們永遠地擋在門外。這種格局的實質要到下一步大災難來臨時才暴露出來。原先腳下不穩的東西，在風雨如磐的特定時期，赫然變成一個巨大的豁口開裂在眼前。財富並沒有豁免他們其中的一些人，等到達集中營換上囚犯的服裝，所有猶太人之間的差距都消除了，一式像沉默的牛羊般任人宰割，不受任何保護。作為一個民族在整體上不具備的東西(如自由)，少數人也無法享受。

將一部分人劃分出去，將他們排除在社會和政治之外，讓這種現象得到廣泛的允許和被視為正常，這只能說明——隔離和隔絕是普遍發生的，不只是降臨在猶太人身上，猶太人並非一個特殊的受難者群體，由此阿倫特的筆觸深入到對現代勞動—消費社會的批判，包括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在1958年再版時為《極權主義的起源》一書增補的章節和同期出版的《人的條件》(The Human Condition) 中，阿倫特用「勞動的動物」(animal laborans) 來形容人數眾多如汪洋大海般的自我隔離和被隔離的人。從表面

上看，他們並不是處於社會的邊緣，而是這個社會的基礎和中堅。他們埋頭從事保證生活必需品的勞動，專注於維持生計，把最多的時間放在自己與身體有着直接關係的活動上，乃至形成這樣一種風氣：謀生賺錢是社會佔主導地位的最為通行的真理，除此以外的其他活動比如藝術被看作是缺少正當性的，是遊手好閒。但這樣一種「專注」的勞動有其固有的封閉性和黑暗性。推動這種「勞動」的是一個人生物性的要求，通過勞動，生物性的人與大自然進行物質性交換，從而得以維持自己生命的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勞動者的意志緊緊黏附於一個人的生命內部，是從生理性、生物性的方面牢牢地抓住自己，在滿足肉體生命的內在循環方面，他是不可能與他人分享的，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的表述是：「他的必要的『新陳代謝』與任何人無關。」在《人的條件》中，阿倫特進一步把這種來自生命必然性的壓力稱之為「暴力」，它從內部施加予我們，與從外部施加的一樣。「除了在嚴刑中使用的暴力，其餘沒有任何一種暴力可以與這種相逼於人自身的自然力量相匹配。」阿倫特注意到馬克思在這個問題中也有相近的表述，他所描述的共產主義社會中的勞動者，便是從苦役般的勞動中解放出來，能夠從事其他活動，而不僅僅是屈從於生命的必然性，屈從於生活的必需品。但是，阿倫特同時指出，馬克思對於人們勞動產品的持續需要和增長估計不足，人們並不是滿足了來自身體的生物性需要之後就洗手不幹，把多餘的時間投放其他更高級的人類活動上面，他們轉而投身於

消費——消費雖然不存在來自必然性的壓力，相反可能是一種過剩的生活，但說到底，消費活動仍然是物質活動，仍然是黏附於人的身體周遭，服從於個體生命內部不能與他人分享的意志，匱乏的「物欲」和橫流的「物欲」深埋於同一個起點之中。由「勞動—消費」構成的鏈條，和一個人新陳代謝的生物循環 (biological cycle) 是互相生發的。在消費的活動中，人的其他方面的潛能並沒有得到發揮，佔上風的仍然是人的本能意志。而所有這些，在古典經濟學家的眼裏，是作為其樂融融的未來世界圖景來加以讚美和歡迎的。他們的口號是「增加財富」、「物質富裕」、「最大多數人的幸福」，當這些窮人昔日的夢想被當作「現代社會的理想」來加以實現時，阿倫特寫道，「愚人的天堂」(a fool's paradise) 就來到了。

這個「愚人」便是被縮減成「生物蔬菜水平之上的人」。他的生活密不透風，他將整個生命倚靠在肉體這個最小的犄角裏，不願離開這個壁壘朝外邁出一步。他是屈從的，屈從於自身生物性的需要，這種屈從可能發展為這個人所有屈從的基礎，由屈從自己開始屈從他人，屈從普遍的種種不合理的壓力。而如果他把這種屈從當做旗幟來揮舞，就像哈維爾說的那個蔬菜水果商，在自己店裏堆積的西紅柿、土豆之間放上那樣一條看似無害的流行標語，背後是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他就參與造成了那樣一種普遍的背景，那樣一種「普遍的常規」——不僅自己屈從，同時也要求別人屈從，屈從成了這個社會最為通行無阻的真理和現實。

同為極權主義批判，同樣將「生物性的人」作為批判的起點，由於環境不同，阿倫特所使用的語言和哈維爾有着明顯區別。哈維爾所用的是道德語言，訴諸的是個人的道德心和責任感——生物性的人被剝奪了這個人在道德上、精神上的存在，由於忍受各種屈從使得人們喪失了尊嚴和良知，被謊言籠罩的現實要求一個新的開端即「生活在真實之中」，他甚至有「反政治的政治」的表達，它的策略意味在歲月的流逝中才逐漸顯現出來。而阿倫特使用的是政治語言，訴諸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政治空間，而在她那裏，「政治」的含義本質上意味着「公共性」，意味着開放和參與，政治空間即是公共空間。因此，不管是猶太人的小社會，還是「勞動—消費」的「現代社會」，不同情況的「隔離」和「被隔離」都是被當做一種災難的政治現實來對待的。阿倫特對於被隔離者的種種描述，都是具有強烈的政治性而非存在論的，換句話來說，種種「隔離和被隔離」的人，其實並沒有如同他們自己誤認的那樣超脫於所處環境之外，更不是如有人想像的自己正高高翱翔於眾生之上，而照例被納入所處環境的政治社會結構的，是某種結構中的一方或因素。

「愚人」成了極權主義得以產生的基礎。封閉於自身存在的人陷入那種一事無成的無力感當中，儘管客觀事實並非完全如此。沒有人站到他一邊，沒有人能夠分享他的感情和感受（儘管它們根本沒有表達過），沒有人能夠理解他，誰也不會和他一起行動，因此他無法去做任何事情。他甚至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而感到處於無人的貧瘠荒野之中，阿倫特一再

用「無根」、「原子化」來形容。與此同時，與他人的分離和斷裂，會逐漸演變成與自身的分離和斷裂；在感到不被周圍人接受和信任的同時，一個人會變得不接受和不信任自己；在社會生活中成為一夥沙粒，表明他的自身內部已經風化和瓦解。在他與周圍的同伴和現實失去接觸時，也失去了自身經驗和思想的能力，失去了感知和判斷的能力，過度的主觀生活使得一切變得曖昧不清，原來清晰的基本界限和尺度陷入模糊混亂，原本一望即知的常識變得搖晃不定；在無法得到他人不斷確證的情況下，一個人正當的思想感情陷入癱瘓和虛無，乃至感到自己正處於某種敵對狀態，所有的人都起來反對他，而他也在莫名其妙的反對一切人——在失去了與他人共同的世界之後，他失去了任何有意義的感覺，因為意義只有在共同的世界中才有可能。發動那些陷於受攻擊的恐懼中的人去攻擊其他人，賦予這個人毫無意義的生活一種全面的 (total) 以及「崇高」的含義，正是納粹主義得以當道的原因。

哈維爾也遠非停留在道德立場上面。一方面是「把人降到生物蔬菜水平上的存在」，另一方面——哈維爾說——是由政府實行「公開的賄賂」；「將他縮減成一個初級消費品社會的各種觀念的簡單容器，是打算將他變成複雜操縱的順從工具」，如此，哈維爾完成了對於所處社會政治結構的深刻洞察和揭示。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